



WINPE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F2501

September 2025

## 比较政治学中研究设计的挑战：可对比性与普适性

柴思源 (Peter Chai)

Waseda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 比较政治学中研究设计的挑战：可对比性与普适性\*

\*柴思原 (Peter Chai)

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

**[摘要]** 本文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概述了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及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与发展历程。其次，它从宏观视角介绍了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学术主题与研究方法，并列举了一系列比较政治学者的经典著作。第三，它对年轻学者在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中可能面临的常见挑战和困境进行了分类和总结。本文的简要讨论旨在阐明可对比性和普适性是比较研究的核心所在，并强调在建模过程中既需要直觉也需要准确。同时，比较研究强调持续反思以往研究的局限与不足的重要性，以及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新证据下重新检验过去理论与发现的必要性。

**[关键词]** 政治科学；比较政治学；范式转换；研究设计；可对比性；普适性

##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

在讨论研究设计、理论建构与假设检验的重要性之前，我先对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进行简要介绍。政治科学，正如其组成部分“科学”所暗示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科学，旨在系统地发展可检验和可证伪的理论，用以解释世界，尤其是世界中的各种关系 (Clark, 2009)。它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解释的，而由于其动态性，我们需要不断地修正解释。

政治科学的起源可追溯到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可追溯至古希腊，比如 Socrates, Plato 和 Aristotle 等哲学家的教导。后续一系列政治思想家如 Machiavelli, Hobbes, Locke, Montesquieu, Tocqueville, Rousseau, Kant, Bentham, John Stuart Mill 和 Marx 等留下经典文本，其中不少具有规范性与道德倾向。

与此同时，作为哲学传统的一部分，政治哲学也被 Bacon, Descartes, Pascal, Spinoza, Leibniz, Hume, Hegel, Schopenhauer, Kierkegaard, Nietzsche, Freud, Husserl, Russel, Heidegger, Wittgenstein 和 Sartre 等哲学家发展与改造。这些哲学家们深入探讨了一些与人类存在密切相关的概念，如社会契约、民族国家、主权、权威、法律、民主、正义、自由、平等、权利、义务、阶级斗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由于学科性质，政治研究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神学、人类学和文学等其他社会人文领域都有紧密联系并存在重叠。

## 政治科学中的范式转变

进入当代后，政治科学的各分支学科不再混杂，而有更清晰的界定，例如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全球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研究和比较政治学。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与方法。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它们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首先，它们采取实证立场，依赖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尤其是在处理大型数据并寻找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借助编程语言与软件（如 R, Python, SPSS 和 Stata）以及机器学习技术（如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研究者能够更有效地揭示变量之间相关性的方向、强度和稳固性等。这一新传统受益于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习方法，还有更新颖的最大似然估计、理想点估计、贝叶斯统计、面板数据分析、空间分析、生存分析、定量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

其次，研究者使用标准化的数学语言与形式模型，如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通过数学重新诠释政治思想中的经典文本，并通过策略组合、收益、风险和均衡等概念来简化社会行为体的行为与互动。与前者“归纳”式的方法相比，后者更为“演绎”式。一些源自理性选择理论的著名模型包括 Condorcet winner, median voter theorem,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selectorate theory 和 tipping model。除此之外，关于

政治倾向和行为的研究也受到心理学、行为科学、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等学科的影响，除了问卷调查之外，也结合了眼动仪和 fMRI 等实验仪器的使用。

## 可对比性、普适性与可预测性

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是“可比性”和“普适性”，其重点在于不同国家体制以及公民态度和行为的规律，也就是纵向的国家间的异同和横向的时间上的趋势。换言之，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政治学也力求揭示个人、群体与国家行为的可预测性，尤其是政治制度、治理质量与政治行为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比较政治学的目标是在有限但经过合理选择的案例中，产生可复制且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比较政治学者关注一系列和政治参与、网络和情绪相关的议题，如集体行动、族群和宗教冲突、内战、投票行为、志愿性协会、公民文化、社会资本和价值观变迁；也研究和政治制度和否决者相关的议题，如政体类型（如军事和个人独裁）、政府类型（如总统制、议会制和混合制）、政府形式（如多数政府、少数政府、单一政府和联合政府）、选举制度（如多数制、比例制和混合制）、政党体系（如单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立法（如一院制和两院制）、行政体系、司法程序和福利制度。

他们试图从各种社会舆论与运动相关的数据入手，分析不同人群团体和社会阶层中政治代表、社会断层、竞争和暴力背后的驱动力。这些问题在政治社会学家，如 Lipset, Rokkan, Duverger, Almond, Verba, Lijphart, Przeworski, Putnam 和 Inglehart 的经典研究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比如，现代化理论试图揭示推动民主出现与存续的因素，而这些驱动力可能具有经济与文化双重维度。

尽管区域研究聚焦于单一社会，能够提供细致的定性微观数据，但是一些学者可能不愿应用既有的量表与指数，而是夸大某些群体的“独特性”；这种做法可能是一种偷懒，即仅凭某种笼统的“文化相对论”来“解释掉”与西方理论不符的人类价值观与行为的趋势。相比之下，比较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或宏观视角，减少了缺乏定量基础的“民族中心主

义”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权重。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可能会导致 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认知混乱）和 definitional gerrymandering（定义操控），因为文化往往是可塑的，而非固定不变的。

## 相关性和因果性

接下来我展开讨论比较政治学者及政治学者普遍面临的一些常见挑战。第一个挑战在于方法论。尽管有些政治学者会设计实验，通过分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受控的实验环境中测试因果关系，但大多数人使用次级数据（如调查数据和选举数据）因为资金有限而进行观察性研究，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如 probit 和 logit 回归分析）。在许多情况下，观察性数据来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自然实验”，其中包含跨国与跨时间的变化。

总体而言，实验研究往往能为因果关系提供更高的可信度，而基于自然发生事件的观察性研究则可能带来更强的普遍性。由于存在大量潜在的混杂因素干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贸然得出因果结论是危险的，有时研究者甚至会混淆因果方向。虽然政治学者的最终目标往往是寻找因果关系，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只能找到与相关性有关的证据。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就会在做出因果推断时保持谨慎，考虑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这些变量可能对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施加某些影响。研究者也需要谨慎列出重要的控制变量与虚拟变量，以尽量模拟 *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不变）。两个经典的例子可以说明因果与相关性混淆的问题：“太阳并不是因为公鸡打鸣而升起”；“夏天溺水人数增加并不是因为人们吃了冰淇淋”。

## 数据收集和理性选择

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收集。由于信息不完整或数据不可得，政治学者有时会依赖便利抽样，或在小样本观察研究中随意地挑选几个案例，这可能导致理论的普适性因案例选择偏差而受到威胁。正如我们常见到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往往源于对欧洲与北美等西方社会的

观察，而拉丁美洲、北非、中东欧和东亚的一些社会，还有一些“脆弱国家”，却常常被忽视。

第三个挑战是，有些采用形式模型的政治学者过于自信地相信人类理性。换句话说，在原本的经济人的模型中，他们假设个体偏好稳定一致，认为社会行为者具有良好的计算能力与完全的信息获取渠道，从而能够识别所有可行选项，评估每一项收益，进行排序，并持续不断地即时选择最佳选项。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假设往往并不成立。由于认知偏差与信息不对称（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人类并不总是拥有稳定一致的偏好，也不一定对外部信号与冲击做出足够敏感的反应。

## 理论、方法论和证据

我们既需要有良好的理论，也需要有扎实的证据。我们需要具体的理论与假设，以便能够通过相应的证据来检验它们。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模糊含混的问题，而这也是“科学”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明确的问题，政治研究才能建立在统计与数学工具的基础之上。但研究并不仅止于此。

选择不同的方法论与数据集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应该始终警惕前文提到的常见错误与谬误，例如案例选择偏差、遗漏控制变量、因果倒置、以及相关性与因果关系的混淆。统计与数学模型固然有帮助，但我们不能在不质疑模型中潜在系统性偏差，盲目接受统计结果与数学推演，正如一些所谓“数据挖掘者”可能做的那样。

当既有模型总是难以解释新证据时，方法论的范式转变就可能发生。这也是 Geddes (2003) 将理论比作可修改的“沙堡”的原因。当我们尝试使用跨国与跨文化的调查数据集时，应该经常检查问卷与访谈在不同社会中的表述、翻译与实施是否一致和规范。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具备自我反思的习惯，在撰写论文时主动评估并承认自身可能的缺陷与局限。我们不仅要传达研究在弥补特定研究空白方面的重要性，还应为我们在抽样、测量与方法选择上相较其他可行选项的理由提供充分解释。

例如，为了检验现代化理论，我们不仅需要界定并测量“民主”（如采用极简/程序性或实质性、二元或连续的方法），还需对政体类型进行分类（如二元或连续方法），并考虑、剖析并编码那些相互影响的经济、社会、文化、人口、语言、历史、技术和国际因素，还有“石油诅咒”或“资源诅咒”和“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在方法论选择上的决策。再比如，当我们要衡量政治参与时，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参与“活跃度”的讨论层面，信息量将十分有限。如果能够将其细分为投票、竞选活动、社区活动和个人接触等类别，并分析参与者本身的人口构成，则会更具意义。在党派竞争不充分的社会中，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可能将礼仪性参与排除在外。

还有一个例子是研究“经济投票”时。我们需要区分党派支持或偏好与实际投票选择，将“经济状况”细分为经济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执政党与在野党进行二元划分，也不能直接假设联合政府中不同党派受到的经济影响是对称的，更不能假设经济上升与下行的影响效果是对称的。上述三个比较政治学研究案例，包括 Przeworski, et al. (2000), Verba, et al. (1978) 和 Van der Brug, et al. (2007)，都从以往研究中汲取了经验，并在概念测量与模型设定方面做出改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了过去的不足。

##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科学推动我们去清晰地界定、测量并操作化政治概念，而这些概念乍看之下可能模糊不清。学者们已经发展出一些指数，用于跨时间与空间的比较，比如 Civic Community Index (Putnam, 1993) 和 Post-Materialist Index (Inglehart, 1997)，他们通过问卷调查研究社会资本和自我解放型价值观。

我们的学术好奇心驱使我们去探究因果关系，但要成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可能需要谨记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不仅要有谦逊的态度去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还要有勇气去批判他们的假设，并将他们的理论应用到被忽视的地区和未经检验的情境中，以此扩展社会科学的边界。第二，我们可能需要防范并敏感地察觉数据收集与统计处理中潜在的系统性偏

差。第三，我们应该尽力使标准化的语言，通过提出明确的问题来避免歧义，从而使研究更容易被学界同仁理解，并使学术交流与同行评议更加可行与高效。

正如 Popper 所认为的，“科学”的重要基础在于通用语言与同行评议。学习政治科学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政治家、外交官或公务员，而是源于我们对理解自我与周遭的渴望，源于我们对社会现象进行剖析与解释的需求，以及不断追问：在其他语境下的新证据面前，我们的解释是否仍然成立。这一目的并不是要改变现实政治。

我们应该同时依赖直觉与方法论能力，去识别研究空白、提出理论、检验假设，并遵循学术界的专业标准与既定规范。只有保持充分的谨慎与怀疑，并具备责任心与才能，我们才能以有效与可靠的方式作出推断，并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最后，对我而言，比较政治科学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中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足够关注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限定于特定条件和容易受到其他变量的潜在影响。

### **[参考文献]**

- [1] Clark, W. R., Golder, M., and Golder, S. N. (2009).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CQ Press.
- [2] Geddes, B. (2003).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 Przeworski, A.,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and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 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6] Van der Brug, W., Van der Eijk, C., and Franklin, M. (2007). *The Economy and the Vot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ions in Fifteen Count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Verba, S., Nie N. H., and Kim, J.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作者简介]

柴思原，别名柴田海、Peter Chai，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他拥有早稻田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与公共舆论。他的研究使用跨国问卷调查数据（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分析公民态度（比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家庭与性别观念、环境保护意识和反移民情绪）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和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关系。